

專輯論文

## 中國傳播期刊知識生產的依附性： 意識形態、機構利益與社會關係的制約

李紅濤

### 摘要

借助布爾迪厄的有限文化生產場域概念，本文探討學術場域內外的各種力量如何制約中國傳播期刊的知識生產。傳播期刊運作於單位體制之內，其自主性空間受到內外力量的雙重擠壓。在場域外部，受制於政治意識形態，期刊展開理論宣傳與自我審查。期刊亦受制於經濟考量，通過尋租活動建立補償網絡。在場域內部，期刊把關受到機構利益及社會關係的影響，導向特殊主義的實踐。概言之，期刊場域的低度自主，體現出依附性知識生產的邏輯。

關鍵詞：傳播期刊、場域自主性、單位體制、特殊主義、依附性知識生產

---

李紅濤，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為知識社會學、國際傳播、媒介社會學、傳媒與集體記憶。電郵：lihongtao@zju.edu.cn

---

Special Issue Article

## Constraint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ina's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deology,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and Social *Guanxi*

Hongtao LI

---

### Abstract

Drawing upon Bourdieu's theoretical concept of a "restricted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constraint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ina's communication journals.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operate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danwei* system. The autonomy of the publishing field is undermined both by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journals are vulnerable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cerns. Theoretical propaganda and self-censorship in the editorial room ensure political correctness, while rent-seeking activities establish a "web of subsidies" for underfunded journ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anwei* affiliation and the monopolization of editorial power create various opportunities for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guanxi* and lead to a multi-layer particularism. This state of field autonomy manifests the logic of dependency, in which the state plays a vital role.

**Keywords:** communication journals, academic autonomy, *danwei* system, particularism, dependent knowledge produc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i, H. (2013). Constraint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ina's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deology,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and social *guanxi*.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 81–112.

---

Hongtao LI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Media &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edia sociology, media and collective memory

## 引言

學術期刊在科學傳播中佔據核心位置。作為科學共同體內部制度化的把關者，學術出版「先是評鑑知識，繼而再將知識傳佈出去」(Crane, 1972: 117)。西諺云「不發表，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學術出版不僅關係到學者的學術生命，更在科學共同體內承擔兩個核心的功能。第一，作為質量控制機制，確保符合學術標準的產品進入公共領域流通；第二，作為學術交流渠道，經由評審互動、書評、專題論壇等形式，維繫共同體的有機連帶關係。

中國大陸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處於單位體制之下，形成一套獨特的制度與運行規則，在進入門檻、經費來源、編輯構成與評審模式等方面都迥異於港台乃至西方以同行評審為核心的學術出版體制。此外，自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學術界廣泛推行自上而下的量化評鑑體制，期刊級別與論文數量變成評價研究表現的最重要的指標。這一結構性的轉型過程，將學術期刊推到科學場域的核心位置。同時，也導致期刊場域在單位體制之下進一步分化，並對知識生產的外部環境與內部生態產生深遠影響。

因此，透過學術期刊這扇窗口，我們可以一窺中國社會科學場域的運行邏輯。同時，從學術體制的角度，檢視知識生產的制度框架，也能夠增進對於當下中國傳播研究知識處境的理解。從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及他對於科學場域自主性的討論出發，通過對數種傳播期刊的經驗性觀察，本研究意在探討學術場域內外的各種力量如何與出版體制互動，影響知識生產的自主性與學術知識的有效性。本文關注的研究問題包括：傳播期刊如何嵌入國家、學術市場與單位體制之中並形成特定的內部結構與制度特徵？政治與意識形態、市場、機構利益、關係網絡等因素如何進入把關過程並削弱學術自主性？學術期刊的專業實踐在何種程度上再生產學術場域內的支配結構？

本文的主體涵蓋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如何將布爾迪厄的有限文化生產場域概念應用於中國學術期刊的分析。第二部分介紹研究方法與經驗數據。第三部分討論學術期刊的單位制，特別是刊號對期刊場域的影響、單位制度下學術期刊的核心體制特徵，兼及學術尋租活

動與單位制轉型的關係。第四部分探討自上而下的量化評鑑體制如何導致學術期刊場域的分化，並影響期刊的把關實踐。第五部分討論國家權力特別是政治意識形態對於期刊內容的影響，主要圍繞期刊編審過程中的理論宣傳與自我審查實踐，檢討學術期刊的場域外部自主性。第六部分描述與分析由圍繞主辦單位產生的社會網絡孕育出來的特殊主義實踐，檢討學術期刊的場域內部自主性。結論與討論一節，以「依附性的知識生產」總括本文的研究發現，並從國際化、匿名評審的採納等角度討論期刊制度的變革契機。

## 期刊場域與學術自主

學術出版區分於商業出版之處在於，原料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最終產品的消費者。這一關鍵特徵，使得學術出版成為布爾迪厄所說的「為生產者的生產」(production for producers)，即有限的文化生產場域(Bourdieu, 1985)。與面向一般消費者的大規模文化生產不同，有限文化生產場域是指：

一個專為文化生產者所構成的公眾生產文化產品(以及用於欣賞這些產品的工具)的系統……有限文化生產場域傾向於發展出自己的產品評判標準，進而獲致由同儕賦予的真正的文化認可，而這些同行則既是專享的主顧，又是同場競技者(Bourdieu, 1985: 17)。

布爾迪厄(1993: 115)認為，有限文化生產場域的自主性取決於它能否在文化生產與評鑑中發展出獨有的評判標準。這種獨特的評判標準意味着將所有場域外部的力量轉譯為——而不是簡單化約為——場域內部的運行法則，並轉換成生產者在場域內圍繞文化正當性的競爭。在布爾迪厄的論述中，對於有限文化生產場域自主性的威脅，主要來自政治、經濟與社會場域。具體到科學場域，其自主性端賴於它與主導的政治及經濟權力結構以及各類社會需求(social demands)的分離，而自主性的高低則體現在自治(self-regulation)的程度，即能否「發展出自己的必然性(necessity)、自己的邏輯、自己的法則(nomos)(Bourdieu, 2004: 47)。對於學術場域而言，這些邏輯與法則至少包括：

學術產品的質量應該由合乎資格的同儕按照共同接受的標準來評判，場域內的競爭圍繞着學術聲譽展開，而學術聲譽則源於共同體內的同行認可。

布爾迪厄對於有限文化生產場域的界定及對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討論，建立在其場域理論之上。這一理論視角既關注場域內部行動者的策略與慣習，也關注場域自身的結構及其在更為廣闊的權力場域中佔據的位置。他認為，任何場域都具有相對自主性。但是，在對科學場域的討論中，布爾迪厄強調自主性並非既定事實，而是一個歷史性的爭取過程，且需要堅持不懈地維繫捍衛(Bourdieu, 2004: 47)。圍繞自主性的爭奪，展現了場域與外部世界(政治、經濟與社會場域)互動的邏輯。場域的自主性程度越高，它就越能夠貫徹或強加自身的邏輯。反之，場域越缺乏自主性，場域內的行動者越有可能在科學鬥爭中引入非科學的力量(Bourdieu, 2004)。

因此，自主性並非天然地構成場域的主導邏輯。對於中國社會科學而言，這種獨立性或自主性就並非不言自明的存在。鄧正來較早借助布爾迪厄的場域概念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場域。在2000年出版的《關於中國社會科學的思考》一書中，他強調，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牽涉到社會科學場域與其他場域之間的關係，而自主性的匱乏則緣於其他場域對於社會科學場域的支配。這一支配以各種學術制度為中介，同時依靠場域中的行動者與學術制度之間的「契合」關係支撐。在此基礎上，鄧正來(2004a)著文批判中國知識界的兩種「契合」關係，一是知識人對經濟、社會、政治等外部場域的契合，二是知識人與各種「操縱」學術制度安排的腐敗實踐之間的「契合」。此外，鄧正來(2004b)亦呼籲學界展開對知識生產機器(涵蓋職稱評審、學術評鑑、學術出版、社科基金等)的反思與批判，希望藉此理解「自上而下」的「知識規劃」時代，揭示「集體性」、「宰制性」的知識生產活動中的各種權力關係。

在某種程度上，本研究可視為對這些呼籲的回應。在科學場域中，學術期刊扮演重要角色，它既是最為重要的質量控制機制，也被視為學術共同體的公共論壇。在美國以及歐洲學術界，以共同體成員為主體的「同行評審」(peer review)被視為貫徹「自治」原則的核心制度。朱克曼與默頓(Zuckerman and Merton, 1971: 98)指出，同行評審由英國

皇家學會的出版制度演化而來，它「保證了載入科學檔案的知識的可靠性」。楚賓與海克特(Chubin and Hackett, 1990: 1)也強調：「好的科學建基於一個自我監管的專業社群，而同行評審正是科學中實施自我監管的機制。」

不過，無論是出版市場的宏觀結構，中觀的組織環境，還是微觀的評審方式，中國學術期刊與美國、歐洲的模式(乃至香港、台灣參照它們建立的學術出版制度)都有所不同。場域的結構差異，使得我們既要關注期刊場域相對於外部政經力量之獨立性，更要關注場域內部的行動者、機構以及知識生產組織方式對學術自主性的影響。這是因為，學術場域內的實踐者不僅對場域外部力量作出回應，更「有能力將符號暴力及對方法和資源的壟斷強加於共同體之上，而這無疑會阻滯而不是解放知識的探究」(Swartz, 1997: 258)。

對於期刊體制及傳播領域知識生產的既有討論，也顯示出同時關注場域外部與場域內部力量對自主性之影響的必要性。許紀霖(2005a)在一篇評論中，將人文社科期刊的特徵概括為「單位化、行政化、非專業化」，其中便涉及到學術場域內部對於自主性的腐蝕性力量，例如期刊主辦單位的發表需求導致的期刊「自我服務」傾向。在對傳播領域期刊的分析中，杜駿飛(2008: 30)依據文獻計量學指標判定傳播期刊在人文社科領域中處於低端，並指出期刊運作存在諸多問題，包括編校與發表體例不規範、期刊定位模糊(業界與學界期刊混雜、理論與實務兼顧)、學術腐敗(人情稿、有償用稿)層出、專家審稿制度無法落實等等，而這「一系列弊端首尾呼應，已形成制度性、系統性缺陷」。

從傳播期刊延伸到傳播領域的自主性，吳飛(2009a)認為，對學術研究形成制約的力量既來自政治和經濟權力的規訓與誘惑，也來自場域內部日益嚴重的官僚做派以及位置、權力與資源之爭。在這些力量的擠壓之下，部分研究者臣服於權力或金錢，淪為被動的政策解讀者或者為業界出謀劃策的謀士。潘忠黨(2008: 32)亦批評中國傳播學界無力探討「真問題」，而是「要麼伸手向上(即政治權力科層體系的核心)或向業界的話語權力擁有者乞求問題」。本文沿襲這些批評或討論的基本路徑，但更多從場域這一「啟發性概念」出發，將經驗分析落實於期刊的把關

機制，透過分析學術期刊場域的結構、場域內外各種力量對期刊實踐的影響，來探究期刊制度與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

## 研究方法

本文的經驗分析建立在對傳播領域期刊的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之上。研究者選取了六種傳播期刊，首先對其中一家進行了歷時一個月的田野觀察，之後對樣本期刊的16位編輯進行了深度訪談。此外，為了考察期刊出版流程的結果及期刊主辦單位對所屬期刊的影響，研究者還對兩種期刊進行了一項小規模的文獻計量學分析，本文中使用的數據是對刊物作者分佈的描述。

### 期刊樣本

本研究聚焦於新聞傳播領域的六種期刊，力求在討論廣度與分析深度方面達致平衡。所有樣本期刊均被CSSCI收錄，代表了中國大陸傳播期刊的較好水平。同時，如下文所述，CSSCI期刊在學術評鑑當中佔據優勢地位，對這些期刊的探討，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學術評鑑體制對期刊運作的影響。在主辦單位方面，其中四種由新聞院系或研究機構主辦，另外兩種由省級新聞媒體主辦，涵蓋學院派期刊與業界期刊這兩種基本的類型。此外，在刊期（包括兩家月刊、三家雙月刊、一家季刊）等方面樣本也盡量保持多元。因此，對於樣本期刊的描述分析，不僅能夠大體反映新聞傳播領域的期刊實踐，對分析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亦有參考意義。

### 田野調查

2008年5月至6月，研究者對其中一家由省級媒體主辦的期刊進行了歷時一個月的田野觀察。之所以選擇這家業界期刊，除了能夠獲得進入許可之外，亦考慮到期刊的組織特徵。與學院派期刊多由學者擔任兼職編輯不同，業界期刊一般延聘專職編輯並設有實體的編輯部，

這為實地調查提供了具體的地點。當時該刊擁有四位全職編輯，包括一位主編、一位編輯部主任、兩位普通編輯，此外還聘有若干負責發行或財務的行政人員。

在調查之初，研究者即向該刊所有編輯與行政人員表明身份。研究者採取非參與式的觀察方式，瞭解編輯流程，閱讀編輯意見等檔案材料，針對特定編輯決策與編輯進行非正式的交談，並在田野後期進行正式的訪談。研究者在工作日均會出現在編輯部，並在田野筆記中記下當天的觀察、非正式的談話與收集到的編輯材料。田野觀察涵蓋編輯流程的方方面面，包括編輯的職業與專業特徵、編輯的角色扮演與衝突、編輯部內的工作常規，稿件初審、二審、終審及編校過程，稿件評審方式及其標準，編輯與作者之間的聯繫，學術把關過程的內在機制。同時，研究者也將觀察觸角延伸到編輯部之外，試圖將期刊放到其外部環境或「組織場域」(organizational field)中理解，着重考察期刊的辦刊經費來源與替代性的財政支持手段，期刊與主辦單位、國家主管部門的關係，期刊之間的稿源與發行競爭，以及學術期刊與傳播學界的聯繫等。對該刊的田野調查使研究者形成對於傳播期刊運作的初步理解，並為之後的深度訪談奠定基礎。

### 期刊編輯深度訪談

在田野調查後期及調查結束之後，研究者對六家傳播期刊的16位編輯進行了深度訪談。受訪編輯分屬於不同類型的傳播期刊，其中11位來自學院派期刊，五位來自業界期刊；來自業界期刊的編輯均為全職編輯，而學院派期刊編輯均為學者兼職。在編輯職位方面，其中10位為普通編輯，另外六位為編輯主管(編輯部主任、副主編、主編)。在教育背景方面，九位受訪者擁有博士學位，他們均都來自學院派期刊。業界期刊編輯的來源多為資深新聞從業者，因此教育水平略低，大多數也不從事新聞傳播的教研工作。

訪談採取半結構化的方式，歷時最短為30分鐘，最長為180分鐘，平均時長為86分鐘。所有的訪談均以面對面的形式進行，並在受訪者同意前提下錄音。在文獻閱讀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研究者發展

出針對期刊編輯的訪談提綱。一方面，訪談大綱確保所有訪談涵蓋基本的問題，不同訪談對象之間的回應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具體的訪談提綱因應期刊類型（業界還是學院派）、編輯流程特性（例如是否採納匿名評審）及編輯的身份（主編或普通編輯）而做具體調整。在最寬泛的層面上，訪談大綱涵蓋如下方面：個人背景與編輯角色、對學術環境與學術期刊市場的總體評價、所在期刊的基本狀況以及它與主辦單位的關係、編輯主導的評審模式的實際運作、匿名評審實踐、編輯與作者之間的聯繫以及關係網絡對編輯過程的影響等。

### 對作者機構附屬的分析

本文選取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國際新聞界》與復旦大學主辦的《新聞大學》作為分析作者機構來源的期刊樣本。這兩種刊物均為CSSCI期刊，且由國內最具聲譽的兩家新聞學院主辦，兩者之間具有很強的可比性。研究者在兩刊中隨機抽取了407篇文章（《新聞大學》227篇，《國際新聞界》180篇）。樣本的抽取方式如下：《新聞大學》是一份季刊，在1998至2007年的10年間，在每年的四期刊物中隨機抽取一期用於分析；《國際新聞界》在2006年縮短刊期，由雙月刊變成月刊。因此，在1998年至2005年間，在每年的六期刊物中隨機抽取一期用於分析。在2006至2007年間，在每年的12期刊物中隨機抽取兩期用於分析。出現在期刊樣本中的所有論文都被納入分析。由於超過80%的論文是獨著，本研究僅分析了論文第一作者的機構附屬信息。

## 單位體制下的學術期刊

中國大陸的學術出版在制度與實踐層次都受制於國家權威的控制，這種控制主要是通過期刊嵌入其中的單位體制來實現。官方採取行政審批制度來管理新聞出版活動，學術出版也概莫能外。根據《出版管理條例》（2001年生效）與《期刊出版管理規定》（2005年生效），任何機構想要創辦學術刊物，都須要向新聞出版總署提交申請並獲得刊號。能否獲得刊號，不僅取決於申請者是否滿足相應的條件，還取決

於是否「符合國家對期刊及期刊出版單位總量、結構、佈局的總體規劃」。鑒於中國現有人文社科期刊2,700餘種，出版管理部門採取「總量控制」的原則，在現有的格局之下，基本不予批覆新的刊號(葉繼元，2008)。刊號因此成為學術出版市場上最為稀缺的資源，無論對於掌握刊號者還是試圖入場者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要想創立學術期刊，必須在期刊之上設立合乎條件的「主辦單位」與「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負責期刊的設立與正常運轉，主管單位則是主辦單位的上級領導部門，學術出版由此深深地嵌入到單位體制之中。眾所周知，單位是當代中國獨特的社會制度，並不單純指向工作場所，更是社會組織形式與政治控制工具(Walder, 1986；李漢林，2004)。在學術出版領域，國家對於主辦單位與主管單位的資質及它們與出版單位的關係都作出了清晰的限定。同時，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對期刊的人事、財政及出版內容都負有責任。其結果是，主管單位與主辦單位凌駕於期刊之上，構成了存在內部等級秩序的「組織控制」鏈條。它們也由此成為期刊與國家之間的「中介」，並將國家權力錨定於學術出版場域之中。

在單位體制之下運作的期刊，具有如下核心的特徵。第一，在財政上，學術期刊高度依賴主辦單位，很多期刊的辦刊經費來自主辦單位的全額撥款資助，這種單一的財政來源為種種尋租行為埋下伏筆。第二，期刊編輯人員來自主辦單位內部。以新聞傳播領域為例，如果期刊主辦單位是大學院系或研究機構，則編輯部成員多為期刊所在機構的教研人員。如果期刊主辦單位是媒體機構，則編輯部成員多為所屬媒體內資深的新聞從業者。第三，絕大多數期刊採納編輯主導的論文評審體制，學術共同體成員很少有機會介入到期刊把關過程當中。

期刊創立的審批制與期刊運作的單位制，對於學術出版場域的結構、期刊機構與外部學術環境的關係，以及學術期刊的把關實踐，都產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結構性影響。首先，審批體制與國家對於期刊市場的總體控制，劃出合法期刊的邊界，將出版社、專業學會以及晚近成立的學術機構等可能的辦刊主體排除在外，導致學術期刊市場的封閉性和壟斷性，也催生出「學術集刊」(以書代刊)等替代性的出版形式。

其次，學術期刊圍繞科研或社會機構，而不是學科或研究領域建

立，主辦單位的性質往往決定了期刊的編輯政策或取向。在人文社科內領域的期刊中，超過三分之一是由高等院校或社科院主辦的綜合性刊物（朱劍，2007；葉繼元，2008）。這並不是學科分化的結果，而是期刊格局「行政化」的產物。在新聞傳播領域，則存在着「學院派期刊」與「業界期刊」之分（李良榮，2003；陳韜文，2008；吳飛，2009b）。兩類期刊在服務社群、辦刊方針、編輯策略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以致在對於何為「研究」、何為「論文」的問題上存在基本的分歧。但在學術評鑑當中，它們刊載的文章又被同等看待，實質上在學術體制層面，「擾亂了學術界的認同標準，其指向性謬誤影響甚為深遠」（陳韜文，2008: 5）。

最後，刊號的稀缺性，以及期刊與主辦單位之間在人事、財政與編輯活動等方面的緊密聯繫，一方面使得刊物主辦單位變成學術場域內的「特權機構」，不願意將壟斷資源向學術共同體開放。另一方面，刊物被當成主辦單位的附屬品，而不是學術共同體的公共論壇，由此強化了學術場域的內部割據與「山頭主義」。主辦單位的利益訴求，也折射到整個學術出版過程當中。某些學術期刊甚至變成主辦單位「創收」的工具，由此引發利用稀缺的版面空間尋租的種種實踐，包括出版增刊、收取「版面費」、尋求理事單位合作或合辦刊物，以致最為極端的論文交易等。

經濟場域對學術期刊的侵蝕，在很大程度上緣於期刊單一的財政來源及單位體制的轉型。單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基本功能體，在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儘管單位社會並未完全解體，但以往「父權」式的控制或管理方式漸漸式微。在學術期刊場域，期刊的主辦單位——特別是各種社會團體或媒介機構——面臨種種挑戰，逐漸將作為「附屬品」的學術期刊視為財政上的「包袱」。主辦單位不願意再以全額財政補貼的形式資助學術期刊的出版，迫使期刊尋求撥款之外的其他渠道，建立「補償網絡」(web of subsidies) (Pan, 2000)。與單位制式微相並行的，則是量化評鑑體制在學術界的興起，後者為期刊尋租創造了需求與空間。換言之，學術場域中的行動者（特別是資淺學者與研究生）對期刊尋租的契合，折射了量化評鑑帶來的壓力與相應的生存策略（李紅濤，2008）。

## 量化評鑑與場域分化

依附於單位體制建立起來的學術期刊場域，在學術場域廣泛推行量化評鑑的過程中進一步分化。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大陸的知識生產經歷「再度國家化」過程(許紀霖，2005b)。在「科教興國」的旗幟之下，人文社會科學被納入到「國家目標」與「軟實力」的建設當中。隨着一系列自上而下推行的國家工程(例如985工程、211工程)、人文社科領域的重點基地建設與國家社科基金的擴張，國家對於大學以及社會科學的投入都大大加強。國家意志向學術研究的滲透，除了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威壓之外，更多依賴非政治化的「資源」誘惑來實現(Sleeboom-Faulkner, 2007)。與此同時，為了在國家規劃、機構與個體競爭等諸多層面配置資源，以在被認可的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作為標尺的量化評鑑體制也全面推行開來。

具體而言，教育主管部門與各級、各類研究機構逐漸依賴某些量化的期刊指標來評價個體研究者、碩士博士點、研究基地以致大學的學術表現。這些索引或指標將學術期刊分為不同層級。在量化評鑑系統之內，一篇研究文章的「分量」並非取決於其質量與學術貢獻，而是取決於刊載文章的期刊的級別。此外，研究者的總體學術表現端賴於他或她在被認可的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量化評鑑的實質，歸根到底即以數量化為導向、以「以刊評文」為基本模式(楊玉聖，2006)。

對個體的考核構成所有學術評鑑的基礎，這種考核主要在兩種情況下展開，一是職稱評定，二是通過「年度考核」等方式進行的「崗位津貼」的分配。此外，為了激勵學者提高生產力，近年來，很多高校對於發表在頂尖期刊(比如SSCI期刊或中文權威期刊)上的文章還會給予額外的獎勵。如表一所示，對於單篇論文的獎勵可以高達數千乃至數萬元。通過各種考核，研究者變成集體化知識生產機器上的「計件工」(龔刃韌，2005)。而這些獎勵標準，也清晰地折射出期刊內部的等級次序。

表一：國內985、211院校人文社會科學學校級獎勵標準

論文發表刊物類別	獎勵金額(人民幣)	
	985 院校(浙江大學)	211 院校(南京師範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	5,000	10,000
SSCI(研究論文及述評文章)	5,000	7,000
A & HCI(研究論文及述評文章)	5,000	7,000
SSCI(書評)	2,000	未列明
A & HCI(書評)	2,000	未列明
《新華文摘》全文收錄	2,000	未列明
中文一級(權威)期刊	1,500	4,000
CPCI-SSH收錄期刊	1,000	未列明
《光明日報》及《人民日報》(理論版)	1,000	未列明
二級(學科權威)期刊及一般英文期刊	不獎勵	1,000

在學術評鑑中最頻繁使用的標尺是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CSSCI以SSCI為模板，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CSSREC)創制。在1998年推出第一版後，每隔一至兩年更新一次。在最新發佈的2012–2013版本中，CSSCI依據文獻計量指標收錄了535種刊物。在CSSCI創制與運用等方面，可以清晰看到國家意志的影響所在。通過在各種國家主導的項目與國家資助的課題評審中運用CSSCI作為標尺，教育主管部門賦予CSSCI以凌駕於其他期刊指標(例如北圖版核心期刊)之上的特權地位，並將之自上而下地貫徹到機構與個體層面。很多院校依據CSSCI，編制本校認可的期刊名錄，並以此作為評價學術表現的指標，其原因正是：

教育部已將CSSCI收錄的論文數和論文被引次數，越來越多地用以評價學校文科整體學術水平、評價人才、機構和成果以及文科重點研究基地科研實力的重要依據……另在統計「211工程」建設成效、申報各級重點學科、博士點時，文科統計的是CSSCI的數量。上述所有統計口徑，均棄用北圖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暨南大學，2006)

陳光興、錢永祥(2004: 204)曾在比較SSCI、CSSCI與台灣的TSSCI三種索引後指出，「C/SSCI跟台灣版T/SSCI一模一樣，由國

家推動、成為學官建立學術權威的標尺，不同之處僅在於CSSCI收羅較廣，維持住了資料庫的基本形象。」

為了更精確地實施評價與獎懲，評鑑者進一步將被認可的期刊劃分為幾個等級，這種等級主要體現在刊物所載論文在升等或考核中的「分量」(分值)以及金錢獎勵的「額度」(參見表一)。儘管各個學校的期刊標準存在內部差異，但大體上，它們將期刊劃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包括SSCI、A & HCI期刊及極少數頂尖中文刊物(如《中國社會科學》)。之所以將SSCI期刊放到期刊等級體系的頂端，如一所211院校主事者所論，是因為「教育部已將人文社會學科成果評價體系前移，被SSCI、A & HCI收錄論文的多少，已成為衡量高校文科科研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之一；同時，也是顯示一所高校國際化及與國際接軌程度的重要標誌」(暨南大學，2006)。SSCI期刊的尊崇地位，折射出中國高校試圖獲得國際認可的熱望，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導下的學術生產的具體表現，也與台灣、香港及其他東亞國家與地區的學術評鑑產生遙相呼應之處(陳光興、錢永祥，2004；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

第二層級的期刊包括特定學科內的權威期刊或「一級期刊」，它們被視為頂尖的中文期刊，在職稱評審或其他評鑑中佔有較高地位。每個一級學科一般擁有一種權威期刊，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所主辦，例如傳播學科的《新聞與傳播研究》。而一級期刊在出版界原指由各個學科一級學會或相當於一級學會的單位主辦的刊物(鄧燕、李宗確，2001)，不過具體涵蓋對象並不明確，其入選標準往往綜合考慮文獻計量學指標、主辦單位的行政級別(楊玉聖，2004)以及地方學術行政因素(例如不同二級學科的平衡、將本校主辦刊物列入較高級別等)。第三層級則包括CSSCI期刊(新聞傳播類15種)，或被少數學校採納的北圖版核心期刊(收錄期刊數量較多)。

量化學術評鑑的最大問題在於，以外在指標(期刊級別、論文數量)取代了由同儕進行的對於學術品質的實質性判斷，令共同體內的認可與聲譽，讓位於學術行政的邏輯(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就期刊場域而言，量化評鑑對於期刊等級的劃分，導致半封閉的學術期刊市場進一步分化，並在期刊結構、期刊與學術界關係以及學術把關實踐等方面帶來一系列後果。首先，期刊場域呈現凝固化的「中心—半邊

緣—邊緣」結構，這一分化過程並不是圍繞學術聲譽展開，甚至也不完全取決於文獻計量學指標，而是建立在學術行政的邏輯之上。處在中心的即在上述等級體系中佔有優勢地位的期刊，而處在邊緣地位的，除了普通中文期刊之外，還包括未被SSCI收錄的英文或其他外文期刊、未被納入合法期刊範疇的「學術集刊」以及香港和台灣地區出版的華文期刊，其中不乏聲譽卓著者。表一所展現的在非SSCI英文期刊或中文期刊發表研究論文還不如在SSCI期刊發表書評的邏輯，正折射出這種機械劃分期刊等級的做法中蘊含的荒謬之處。

其次，學術期刊的等級化對研究者的學術活動產生強烈的「槓桿」作用，刊物級別成為研究者投稿時的最重要考量之一。在某些重點院校，只有在CSSCI收錄的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才被視為學術成果。一位在211院校任教的副教授即指出，「（在非核心期刊上發論文）相當於沒發……評職稱是沒有用處的，（金錢）獎勵，各方面都沒有用處！」（2號受訪學者）。此外，量化評鑑過分強化期刊的「發表渠道」功能，但與此同時却弱化了期刊作為共同體學術交流的公共論壇之角色。在功利性的學術評鑑體制下，無論是作者還是期刊都沒有動力發表書評等「無用」的文章。鄧正來（2005: 10）就此批評道，學術期刊「未能很好地發揮它們所應當具有的影響研究者個人進行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研究者個人『琢磨』如何能夠發表論文的參照性工具，進而成為研究者個人在相關學術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謀求『統計指標』的一個必需途徑。」

再次，期刊等級劃分強化了由刊號制形成的刊物壟斷地位，從學術刊物的角度，關乎生存的目標之一，即是要在期刊等級中向上流動。一位期刊主編指出，所在刊物被CSSCI收錄之後，稿件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副教授和教授來稿明顯高於未被收錄以前（4號受訪編輯）。一些期刊為了進入CSSCI目錄，甚至運用各種「策略」來提高被引用量，這些策略包括：期刊自引、期刊之間的互惠引用與協議引用、高校學者引用所屬學校的學報等（蘇新寧、鄒志仁，2008）。

最後，量化評鑑的內在邏輯不可避免地導向對於學術生產力的追逐，由此導致大量的學術泡沫。近年來，很多期刊不得不縮短出版周期或擴張每期的容量，來應對巨大的稿源壓力。在傳播領域，若干

CSSCI或核心期刊在過去五年內增加刊期，其中三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新聞界》)從雙月刊改為月刊，一家(《新聞與傳播研究》)由季刊改為雙月刊。除了擴版，另外一種應對稿源壓力的策略是縮減論文的篇幅。《國際新聞界》在2006年改版之際，同時要求「論文字符最多不得超過6,000，超長者不予處理。」儘管其他期刊未對論文的長度作出書面規定，但對稿件字數的限制往往是期刊運作的「潛規則」。其結果是，發表在人文社科期刊上的論文篇幅平均僅為三頁(葉繼元，2005)。通過縮短刊期、擴版及壓縮篇幅等種種策略，期刊刊登的論文數量大幅增加。以新聞傳播領域的CSSCI或核心期刊為例，在過去10年內，多家期刊的容量擴張為擴版之前的兩倍乃至四倍，而這並不是CSSCI期刊或傳播期刊的特有現象。在一般期刊當中，由於收取版面費等「尋租」活動的廣泛存在，這種結構壓力導致的擴版更為嚴重。

## 理論宣傳與自我審查

在國家主導的單位體制之下，對於學術自主性最大的鉗制來自政治意識形態場域。在最微觀的層面上，這種影響體現為期刊內容的政治正確性。由於外部審查機制(閱評與審讀)的存在，以及把關人對意識形態的內化，在期刊編輯過程中廣泛存在理論宣傳、審查與「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實踐。吳飛(2009b: 5-6)即指出，對傳播研究「更多的限制還不是國家政府的直接控制，而是新聞傳播學場形成的自我審查的慣習(慣習的維繫力量主要來源於學術「大佬」和學術期刊的把關者)在左右着學科的進步」。理論宣傳與自我審查實為一體兩面，指向學術把關人因應政治或意識形態需要而對期刊內容作出的積極與消極的調整。

在某種意義上，政治意識形態場域試圖將知識生產轉變為整體性的「理論宣傳」，換言之，「理論宣傳是中國知識生產既有主導力量、又有主導旋律、更有主流脈動的表徵」(任劍濤，2005: 112)。對學術期刊而言，理論宣傳意味着主動或被動地在期刊內容中擁抱主流意識形態導向與論述。近年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意識形態論述以及「三貼近」等新聞政策出台之後，新聞傳播乃至一般的人文社科刊物上總是

會出現大量的緊跟形勢、為政策鼓與呼並論證其正當性的文章。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意識形態場域、期刊場域與學術場域中的研究者三方共同造就的結果。國家意識形態機構通過社科基金課題指南的形式鼓勵闡釋政策、尋求對策的智庫型研究，並通過具體的行政指令來確定理論宣傳的大體方向與具體命題；對期刊而言，遇到特定事件或時機，按照某位主編的講法，也要適當「跟一下形勢」；最後，浸淫於意識形態環境中的作者，為了獲得課題與發表機會，也可能形成積極響應政治與意識形態需要的慣習（吳飛，2009b；潘忠黨，2008）。

理論宣傳既會圍繞一項長期的政策（比如和諧社會）展開，也可能由某些具有意識形態重要性的事件引發。例如，2008年6月20日胡錦濤視察《人民日報》報社並發表講話，中宣部隨後發出通知，要求新聞宣傳戰綫把學習宣傳貫徹胡錦濤講話精神——特別是其中有關「輿論引導」的論述——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通知中還要求引導新聞理論工作者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新聞理論與實踐中的重大問題。在講話發表之後，多家新聞期刊發表文章或組織專題討論。討論當中，不少文章包含了學術觀點的辨析，文章之間也存在着相當大的內部差異，以致某些文章讀起來像官方文件，而少數文章則試圖將官方的表態轉化為在學術表達上尋求突破的話語契機。<sup>1</sup>但大體而言，這些「應景之作」帶有濃重的理論宣傳色彩，表現在文章多數由期刊約稿並由著名學者撰寫、主題先行設定並在大的框架下做有限的發揮，文章往往立意於闡發官方文獻的重要理論意義、論證或至少是認可官方在重大新聞事件中立場的「正當性」。

除了理論宣傳之外，學術期刊運用自我審查機制來確保政治正確。這一機制貫穿了期刊的日常把關過程，但研究者發現，因為這個原因被拒稿的文章比例實質上並不高。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我審查過程並非始自學術期刊這一制度化的「過濾」渠道。在學術場域內長期被規訓的學者，在選題時就會盡量避免觸碰政治敏感題目，進入到期刊把關流程的政治錯誤已經是「漏網之魚」（12號受訪編輯）。

但即便如此，政治把關仍然是學術期刊編輯特別是主編需要特別留心的方面。學術期刊的自我審查，既涵蓋論文選題在宏觀層面上的「政治正確性」，也涉及論文中的具體論述或「提法」是否「恰當」。首

先，選題不能觸及被視為「禁忌」的理論概念或被當做「雷區」的研究領域。在一次審讀工作的會議講話中，時任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石峰(2004)曾提請審查者注意若干錯誤的理論命題，包括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私有化、多黨制、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的「鼓吹」，對黨的歷史的「歪曲」，對中國政治經濟制度、方針政策、宣傳部門與新聞出版管理制度的「攻擊」等。

在新聞傳播領域，理論禁忌通常由兩組命題衍生出來，一組是新聞出版自由，另外一組則與西方民主政治理論或「普世價值」有關，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中國的傳媒體制與新聞政策。吳飛(2009b)曾經列舉部分不能研究的敏感話題，包括媒體的人民性、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公民的表達自由權、新聞傳播立法、敏感消息傳播的限制等。根據研究者的田野調查，編輯的確會認定特定選題觸碰到了理論禁忌，並因而拒稿：

(《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問題與表達自由》)這個稿子的觀點是開放的，對我國的傳播體制改革應該有借鑒意義。但是現實的對信息的嚴格控制，尤其是對新聞傳播界的控制，使得這個文章難以在本刊發表。(14號受訪編輯提供的編輯意見)

在同一位主編提供的編輯意見中，兩篇論文因為討論到新聞法的問題而被拒稿(其中一篇的編輯意見是：文章直接採用的「新聞立法的使命」的標題涉及政治敏感問題，不能採用)。另外兩處則涉及到論文選題與現行媒介政策的衝突，編輯因「獨立雜誌違反現行的傳媒政策」和「自傳媒，不能提，當局不會容忍」而拒稿。此外，一家業界期刊的編輯也因為某篇論文「對『社會公器』提法持贊同態度，並大加評述，這同中央精神有悖」而拒稿(1號受訪編輯提供的編輯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段落中被拒稿的文章，最終刊登在一家政治學期刊上。換言之，對於何為政治正確、理論禁忌的邊界又該劃在什麼地方，在不同領域、不同刊物乃至不同編輯之間，往往存在着不同的判斷。意識形態部門對於何為「政治正確」，也並沒有清晰的指引。而這種模糊性，反而可能是最有效的控制方式。在無法清晰探知「紅

線」所在的情況下，學術期刊把關人惟有依賴政治敏感力(political sensibility)作出判斷。一般而言，這種判斷越是由擔負更大責任的主編做出，越可能趨向於保守。另一方面，理論禁忌的邊界又會隨着大的政治意識形態環境與小的媒介政策的變動而發生變化。在過去10年間，某些舊有的理論禁忌——比如媒介產業化——已經被打破，但新的禁忌可能會浮現出來。例如公共知識分子、媒介作為社會公器等觀念，就曾因為與近年的「普世價值」爭論相關聯遭到中宣部批判，而變成新的理論禁忌。

如果論文選題碰觸到編輯認定的理論禁忌，一般都會導向拒稿。但在多數情況下，自我審查指向論文中的具體「提法」在意識形態層面是否「恰當」。其導致的結果，往往是局部的刪減或者修改，而不是整體的拒稿。這些在政治上比較敏感的提法，涵蓋兩個基本類別：一是對官方政策(如新聞管制)的批評，二是影射或提及敏感時事(人物或事件)。比如下面這份編輯意見，

為了安全起見，不要直接引證李大同……你在學術會尚可以說，但是變成公開發表的文字，還是要考慮如何說得讓人抓不到把柄……不要過多引用現在比較敏感的人物的事例和言論，盡可能不要涉及敏感的事件。(14號受訪編輯提供的編輯意見)

在這篇文章中，政治敏感的內容只是一位被整肅的資深媒體人及其觀點，因此並不會導致論文被拒稿。面對具體論述帶來的政治不正確問題，編輯往往是通過刪除敏感段落或弱化批評的尖銳性來處理。例如，在另外一家期刊的稿件編輯階段，編輯直接將下面這些句子刪除：「因此有人戲稱廣電總局『不愛規章愛禁令』」；「路透社記者向全世界發佈：中國兩個言辭大膽的博客『按摩乳』和『奶豬』被政府下令關閉，這是中國控制整頓互聯網的新一輪行動」。<sup>2</sup>另外，一位作者撰寫的有關新聞專業主義的論文，其中論及1980年代的著名記者劉賓雁及其專業實踐。文章獲得一家CSSCI期刊刊登，但涉及劉賓雁的段落被整體刪除，原因是劉賓雁曾經被開除黨籍，是不能夠在公開出版的文章中提及的「敏感人物」。<sup>3</sup>

## 制度漏洞與特殊主義實踐

在單位體制之下，從學術期刊專業實踐的角度考察知識生產的自主性，不能僅僅着眼於場域外部的力量，還要關注場域內的各種利益主體——包括學術期刊的主辦單位以及處在學術場域不同位置上的作者——如何運用非學術性的資源或權力來爭奪出版空間。其中一項值得深入討論的非學術性因素，即作者的機構附屬與社會資本。在中國學術出版的制度環境與文化之下，作者握有的社會資本以近乎制度化的方式進入期刊的日常運作過程，遂演變成一種特殊主義實踐，並由此削弱知識的正當性與學術把關的自主性。

論文作者運用社會資本獲得發表機會，在學術界被形象地稱呼為「關係稿」或「人情稿」，而對此現象，學界也多有批判(陳韜文，2008；杜駿飛，2008；吳飛，2009b)。這些批判傾向於將關係稿與學術腐敗相聯繫，但須要強調的是，關係在期刊場域中的運作機制與工作分配或私營企業經營等社會場景不同。一方面，期刊把關人與作者存在於同一個學術場域當中，他們在其他層面的互動會對關係實踐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對期刊運轉而言，關係既意味着壓力、也意味着資源。很多時候，期刊積極地培育適當規模的關係網絡以向知名學者約稿、尋找評審或向特定機構尋求財政支持。因此，關係運作絕不單單是一則簡單的「道德」命題，而是複雜的社會實踐，須要聯繫學術出版的制度環境、把關過程以及社會網絡的特徵進行深入檢視。

單位體制之下的期刊場域存在諸多「制度漏洞」(institutional holes)，為關係網絡與社會資本的運作創造了種種空間與機會。首先，期刊與主辦單位之間在財政與人事上的緊密聯繫，使得期刊有義務服務於主辦單位的地方利益。期刊編輯由主辦單位內部招募，也令他們深深嵌入到圍繞主辦單位形成的關係網絡之中，在日常把關實踐中面臨巨大的人情壓力。其次，人文社科期刊多採納編輯主導的評審方式，而非同行評審體制。在傳播領域，儘管有幾家期刊宣稱採納匿名評審，但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納入專家評審，編輯決策的主體仍然是期刊編輯(杜駿飛，2008；吳飛，2009b；Li, 2011)。在這種審稿機制下，評審權力高度集中，具體表現在：第一，絕大多數評審決定

由編輯做出；第二，在論文初審階段，普通編輯擁有排他性的權力，特別是在拒稿方面；第三，在整個學術把關過程中，較之於普通編輯，主編擁有更大的決斷權。期刊對於版面資源的壟斷以及把關過程中評審權的集中，使得編輯一方面有能力給予特定作者以特殊對待，另一方面也的確將他們暴露在關係網絡的影響之下。

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在不同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運行方式存在很大差異，在學術出版當中，作者通過社會資本換取的「資源」不僅僅是發表機會。關係的運作有可能加快非正式的信息流動，提高稿件在評審與排期隊列中的優先性，或提高論文的發表機率，由此形成多層次的特殊主義(multi-layer particularism)。其一，由於期刊正式反饋渠道付之闕如，關係網絡變成一種補償性的、高度選擇的溝通方式。作者通過這一非正式渠道獲得評審結果與評審意見、編輯政策、編輯對於特定主題的偏好等。其二，在期刊編輯過程中，對於論文的評審、排期一般會依來稿順序進行，但關係資本則可以打破這一自然順序，縮短論文的發表周期。

其三，通常為學界所詬病的「關係稿」其實指向關係實踐的第三個層次，即社會網絡的運作對編輯決定產生實質性影響。關係可能在如下幾個方面提高特定稿件的發表幾率：(1)編輯對稿件投以更多關注；(2)編輯給出(更為詳盡的)評審意見或修改建議並請作者提交修改稿；(3)稿件繞過特定的評審程序，比如免除初審，直接交由主編終審。由於初審拒稿的比例非常高，免除初審大大提高了論文最初的刊登機率；(4)某些稿件會不經評審即接受刊登。

在期刊場域以及學術場域內部，圍繞着學術期刊編輯、期刊機構及其主辦單位，形成了一個由內向外、由中心向邊緣延展的複雜的社會網絡，涵蓋各種個體與機構聯繫。處在網絡不同位置上的作者，運用社會資本影響學術把關過程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由此導向不同的特殊主義實踐。處在社會網絡核心的是期刊主辦單位，單位同事的私人關係與機構集體利益共同造就了學術出版中的「單位效應」，即主辦單位在附屬刊物上佔據優先或支配地位。肖燕雄等(肖燕雄、曹炎、楊曦，2010)發現，新聞傳播領域的期刊——特別是學院派期刊——存在非常明顯的「院內發文」現象。郭可等(郭可、張軍芳、潘霽，2008)

對兩種CSSCI期刊的內容分析也發現，期刊刊載主辦單位論文的比例遠超其他機構。本研究對《國際新聞界》與《新聞大學》第一作者所在機構的分析發現(表二)，單位效應在兩份期刊都相當明顯，各有36.1%與31.7%的樣本刊物的版面被所屬機構的作者佔據。更重要的是，兩家機構的在另外一種刊物上的學術表現要顯著低於( $X^2 = 112.17, df = 2, p < .0001$ )在所屬刊物上的生產力。

表二：《新聞大學》與《國際新聞界》的第一作者機構附屬

第一作者所在機構	期刊(主辦單位)		合計
	新聞大學(復旦大學)	國際新聞界(中國人民大學)	
復旦大學	36.1 %	1.7 %	20.9 %
中國人民大學	2.6 %	31.7 %	15.5 %
其他 <sup>4</sup>	61.2 %	66.7 %	63.6 %
論文篇數	227	180	407

$X^2 = 112.17, p < .0001$

儘管學院派期刊的主辦單位多是新聞研究重鎮，但「單位效應」却並非完全取決於研究實力，而是組織化特殊主義實踐的產物。依據本文的田野調查，單位效應主要是由以下幾種機制造成：第一，期刊對機構作者設定發表配額；第二，機構作者可以跳過特定的評審程序；第三，在個體層次，期刊編輯給予機構作者特殊對待或偏袒。其中的第一種機制只針對機構作者，後兩種機制儘管也存在於其他關係運作場合，但在機構內部更為普遍，對學術把關過程的影響也更為深廣。

所謂發表配額，是指期刊規定機構作者一年之內最多只能在所屬期刊上發表一篇(季刊或雙月刊)或兩篇(月刊)論文。在研究者調查的六家期刊中，至少四家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設定發表配額。這種做法是期刊編輯部與主辦單位達成的某種妥協。一方面，配額可以被視為期刊給予機構作者的優待，也在最低限度上滿足了主辦單位的發表訴求與利益。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期刊免受過多的關係請託之累。儘管發表配額為機構作者設定了上限，但在實際中總是存在討價還價的空間，在機構內部擁有學術或行政權力的作者可能會打破這一配額。

與配額規定類似，將機構作者免除初審的做法，既是廣泛存在的

類制度化安排，也是期刊編輯應對人情壓力的「策略」。此外，機構作者也可能越過編輯將論文提交給主編，由他們直接終審並插入到排期隊列之中。短期來看，單位效應表現為期刊對機構作者的「過度呈現」。長遠來看，單位效應會導致擁有期刊的學術機構的最初優勢不斷累積、自我放大(cumulative advantages) (Allison, Long & Krauze, 1982)，強化區域主義與地方保護主義，進而再生產學術場域內的學術霸權。

在主辦單位的門牆之外，更多作者謀求透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對學術把關施加影響。這些社會資本的內涵以及關係實踐的方式主要取決於以下兩個分析性的維度：一是處在關係網一端的是普通編輯還是主編，二是作者與編輯之間是直接還是間接的聯繫。一般而言，與主編之間直接聯繫能夠帶來最大的社會資本，也能對期刊把關產生最大的影響。不過，對於大量處在網絡邊緣位置的作者而言，與編輯之間通過網絡橋樑(network bridges)建立起來的間接聯繫顯得更為重要，也值得深入討論。

在學術出版場域，主要的搭橋方式(bridging activity)包括「推薦」與名義上的「合作署名」，這兩類間接聯繫都可能對編輯形成較大的人情壓力，並因而影響編輯決策。在前一種搭橋方式中，作為橋梁的推薦人與稿件並無關聯，他們只是將文章推薦給編輯並請他們在把關時給予特別對待。編輯的照顧，也純粹是出於對推薦人的尊重或「人情」。但與此不同，名義上的署名則是一種更有力也更複雜的搭橋行為。一位業界期刊主編講述的這則故事清晰展現出其間的運作邏輯：

一般來說有這些博導、著名的學者，如果有他掛名的，我們一般都要發(表)。當然中間呢……他有時候掛上導師的名字以後，他到快發的時候他說，我們導師說把他的名字去掉吧。我直接就跟他說，如果你導師(的名字)去掉，你的文章直接去掉……直接撤稿。(4號受訪編輯)。

由此可見，名義上的合署者並非獨立於作者與編輯之外的「中間人」，但也並不是真正的「合作者」，合署行為帶有非常強烈的工具性。在面對此類投稿時，除了對於搭橋行為的評判，編輯同樣會考慮合署

者的聲譽與地位。合署者的「身份」(教授職稱或行政職務)既對期刊編輯施加一定的人情壓力，也帶來了相應的「資源」，由此提高了搭橋策略的有效性。

從組織化的單位效應，到對特定作者的偏袒，關係變成期刊場域的類制度化特殊主義機制，參與分配編輯的注意力與稀缺的版面空間。同時，圍繞各種個體與機構聯繫展開的關係實踐，無可避免地將學術品質之外的因素帶入學術判斷之中，由此降低刊物的質量。關係網絡對於學術把關過程的影響，也削弱了知識生產場域內專業判斷的正當性。在這個意義上，關係變成學術場域內生的腐蝕性力量，既有悖於科學精神與學術自主性，也阻礙了學術場域內逾越特定機構之上的學術共同體的發育與成長。

## 結論與討論

本文借用布爾迪厄的有限文化生產場域概念，以傳播期刊為個案，探討來自學術場域外部與內部的各種力量，如何影響期刊把關過程，進而塑造傳播領域知識生產的面貌。本文發現，與布爾迪厄對當代西方科學場域的分析不同，自主性並沒有成為在單位體制之下運轉的中國期刊場域的主導邏輯。因此，本文在以下三個方面拓展了布爾迪厄對於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討論。第一，中國學術場域並未形成共同體的觀念，對於自主性的威脅既來自場域外部的政治、經濟力量，也來自場域內部的非學術性力量。第二，政治意識形態場域與經濟場域等外部力量對於場域內行動者的影響並不需要轉譯過程，而是長驅直入，這恰是因為場域缺乏「完全根據社會科學知識的規定性及增長邏輯而建立起來的學術制度」(鄧正來，2000: 25)——例如期刊實踐中的同行評審體制——充當防火牆。第三，學術場域內部充當外部力量「代言人」或與體制「契合」的行動者，未必在場域中處於被支配地位，在很多時候，正是精英機構或「主流」學者在實施「符號暴力」。更重要的是，場域內部的行動者不僅對外部力量作出反應，他們通過社會資本等非學術性資源在期刊場域展開競爭，構成一種內生性的腐蝕力量。

上述諸種力量的互動，導致中國期刊場域呈現高度分化與低度自

主的格局。其分化邏輯沿着幾個方向展開。首先，刊號制度劃定了學術期刊市場的邊界，區分合法期刊與非法期刊，進而導致場域的封閉性。其次，期刊在組織附屬與專業運作上的「單位化」，形成地方割據與「山頭主義」。場域內部的關係網絡，表面上逾越不同單位之上，但實質上仍以「期刊機構」為核心並向外延展。再次，量化評鑑體制則導致學術期刊場域的進一步分化，形成不同的等級。須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中國期刊，還是海外期刊，自然都會分化為不同的層次，但關鍵性的差異在於分化的機制。在自主性較高的學術期刊場域，期刊的內部分化建立在「學術聲譽」的累積與認可之上。但在中國的期刊場域中，儘管CSSCI等指標的建立也考慮到文獻計量學中的引用量與影響因子等因素，期刊等級的建立更多取決於學術行政的考量。

在單位體制與編輯主導的評審體制之下，傳播期刊把關過程中折射出來的學術自主性空間受到場域外部與內部力量的雙重擠壓。在場域外部，學術期刊的把關受到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為了確保政治正確，學術期刊會在積極的層面展開理論宣傳並在消極層面進行自我審查。同時，單一的財政來源與單位體制的轉型，使得期刊亦受制於經濟考量，部分更展開尋租活動建立補償網絡，導致學術生態的惡化。在場域內部，學術把關的權力高度集中於機構編輯，期刊的專業運作受到主辦單位機構利益及社會網絡的影響，導向各種特殊主義的實踐。其結果是，權力、意識形態、金錢、機構附屬與社會網絡等等非學術性因素，都可能以常規的、甚至是類制度化的方式進入到期刊的編輯決策過程，由此侵蝕專業判斷的根基並降低學術知識的有效性。

期刊場域內外互動的主導邏輯正是依附性知識生產的邏輯：學術把關依附於期刊編輯、期刊機構、主辦單位（主管單位）、國家，這種縱向的依附性形塑了學術自主性的內外維度。<sup>5</sup>在依附性知識生產中，國家扮演著支配性的角色。任劍濤(2005: 110)認為，國家「之構成為中國知識生產機器的主導性力量，是因為『國家』在知識生產的結構中扮演著知識生產設計者、資源配置者與知識成果決定性購買者的角色。」國家意志同樣貫穿於期刊場域的結構化與把關實踐當中。通過刊號與單位制度，國家塑造了期刊場域的基本結構。國家主導的量化評鑑體制，直接作用於學術生產場域，間接對期刊場域產生影響。在微觀層

面，政治意識形態場域又導向對期刊的審查、政治評價以及相應的理論宣傳與自我審查。

國家意志之外，同樣須要強調的是依附性知識生產中的單位邏輯。一方面，單位構成國家意志的延伸。期刊場域的「單位化」，導致了經濟場域對於期刊運作的介入，同時亦勾勒出關係網絡影響期刊決策的基本路徑。另一方面，期刊的依附性，又與研究者的知識生產依附性相互呼應、彼此強化。以致於，無論是針對期刊尋租、關係運作、學術把關中的資源壟斷，還是量化評鑑體制，學術界都無力抑或不願進行系統的反思與抵抗，在在顯現出學術共同體的脆弱與失語。因此，對於傳播領域以及其他人文社科學科而言，如何相對於場域外部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權力乃至市場力量、相對於場域內部的單位利益(山頭主義)、學術行政與學術霸權，建立學術產品的同行評鑑體制、培育學術共同體、拓展自主性空間，顯得尤為緊迫。

近年來，在依附性知識生產的基本格局之上，期刊場域也出現某些轉型的契機。一是同行評審機制的局部引入。新聞傳播領域的部分期刊，已經開始引入匿名評審機制。儘管在很多期刊，編輯部之外的專家評審並不是非常深入徹底，機構編輯的權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持，但期刊運作畢竟不再完全封閉，而具有了一定的開放性(Li, 2011)。問題是，如何將這些小範圍的試驗擴展為學術期刊把關的通則？同時，如何逾越期刊機構的門牆，讓共同體成員更積極地參與到學術把關過程，由此提高學術期刊的公共品質？

二是國際化的積極影響。如前所述，國際化的趨勢(突出表現在SSCI的優勢地位)彰顯了國家意志，但這一進程也可能對期刊場域產生積極影響。國際化令為數眾多的海外華人學者進入中國的學術生產場域。同時，中國內地學者在英文期刊及台灣、香港期刊的發表與評審經驗，構成國內知識生產的重要參照與示範。須要強調的是，所謂「國際化」，不應眼光只向着歐美、局限於「西方—中國」的兩造敘事，而可以變成「歐美—亞洲—台灣香港—大陸」的多層次參照階梯，由此拓展對於國際化的想像空間。同時，英美學術期刊多由專業學會或出版機構創辦與主持，而港台期刊則多為機構刊物，這亦可為單位制度下的中國期刊提供有益的參照。

## 註釋

1. 比如對於胡錦濤在《人民日報》報社的講話，展江(2008)解讀為「審慎而積極地調整國家—媒體關係」，陳力丹(2008)則強調講話中的「按照新聞傳播規律辦事」等。
2. 田野筆記，2008年6月12日。
3. 作者與該文作者及該刊編輯的私下交流。
4. 其中發文數量佔據第二位(僅次於主辦單位)的機構，發表文章佔樣本的比例均不超過5%。
5. 本文使用的依附性知識生產概念以及相關討論，受到陳韜文教授的啓發，特此致謝。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2005)。《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Fansi huiyi gongzuo xiaozu. (Ed.) (2005). *Quanqiuhua yu zhishi shengchan: Fansi Taiwan xueshu pingjian*. Taipei: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she.
- 石峰(2004)。〈大力加強報刊審讀工作，更好地為監管工作服務〉。《中國出版》，第11期，頁12-16。
- Shi Feng. (2004). Dali jiaqiang baokan shendu gongzuo, genghaodi wei jianguan gongzuo fuwu. *Zhongguo chuban, No.11*, pp. 12-16.
- 任劍濤(2005)。〈國家、機構與生產者：三邊關係與知識生產〉。鄧正來(編)，《中國書評》(第三輯)(頁110-11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Ren Jiantao. (2005). Guojia, jigou yu shengchanzhe: sanbian guanxi yu zhishi shengchan. Deng Zhenglai, (Ed.), *Zhongguo shuping (disan ji)* (pp. 110-119).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朱劍(2007)。〈徘徊於十字路口：變革中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清華大學學報》，第4期，頁70-89。
- Zhu Jian. (2007). Paihuai yu shizilukou: Biange zhong shekeqikan de shige liangnan xuanze. *Qinghua daxue xuebao, No. 4*, pp. 70-89.
- 杜駿飛(2008)。〈沉重的翅膀：期刊迷局與新聞傳播學的解放〉。《中國傳媒報告》，第2期，頁16-32。
- Du Junfei. (2008). Chenzhong de chibang: Qikan miju yu xinwenchuanboxue de

- jiefang. *Zhongguo chuanmei baogao*, No.2, pp. 16–32.
- 李漢林(2004)。《中國單位社會：議論、思考與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LI Hanlin. (2004). *Zhongguo danwei shehui: Yilun, sikao yu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李紅濤(2008)。〈量化評鑒之下的學業/學術實踐〉。《中華傳播學刊》，第13期，頁181–222。
- LI Hongtao. (2008). *Lianghua pingjian zhixia de xueye, xueshu shijian*. *Zhonghua chuanbo xuekan*, No. 13, pp. 181–222.
- 李良榮(2003)。〈期待創新——審視新聞傳播學學術期刊〉。《新聞記者》，第3期，頁12。
- LI Liangrong. (2003). *Qidai chuangxin: Shenshi xinwenchuanbo xueshu qikan*, *Xinwen jizhe*, No. 3, p. 12.
- 吳飛(2009a)。〈傳播學研究的自主性反思〉。《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121–128。
- Wu Fei. (2009a). *Chuanboxue yanjiu de zizhuxing fansi*. *Zhejiang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No. 2, pp. 121–128.
- 吳飛(2009b)。〈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生產場域透視〉。《當代傳播》，第4期，頁4–10。
- Wu Fei. (2009b). *Zhongguo dalu chuanboxue zhishi shengchan changyu toushi*. *Dangdai chuanbo*, No. 4, pp. 4–10.
- 肖燕雄、曹炎、楊曦(2010)。〈新聞傳播學期刊「院內發文」現象研究〉。《東南傳播》，第6期，頁9–11。
- Xiao Yanxiong, Cao Yan, & Yang Xi. (2010). *Xinwenchuanbo xue qikan yuannei fawen xianxiang yanjiu*, *Dongnan chuanbo*, No. 6, pp. 9–11.
- 陳光興、錢永祥(2004)。〈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6期，頁179–206。
- Chen Kuan-Hsing, Chien Yeong-Shyang. (2004). *Xin ziyou zhuyi quanqiuhua zhixia de xueshu shengchan*.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No. 56, pp. 179–206.
- 陳力丹(2008)。〈論胡錦濤關於傳媒工作的新思維〉。《當代傳播》，第5期，頁4–6。
- Chen Lidan. (2008). *Lun Hu Jintao guanyu chuanmei gongzuo de xin siwei*. *Dangdai chuanbo*, No. 5, pp. 4–6.
- 陳韜文(2008)。〈中國傳播研究的發展困局：為什麼與怎麼辦〉。《新聞大學》，第1期，頁1–7。
- Joseph Man Chan. (2008). *Zhongguo chuanbo yanjiu de fazhan kunju: Weishenme yu zenmeban*. *Xinwen daxue*, No. 1, pp. 1–7.

- 郭可、張軍芳、潘霽(2008)。〈中美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比較研究〉。《新聞大學》，第1期，頁53-63。
- Guo Ke, Zhang Junfang, & Pan Ji. (2008). Zhongmei xinwen chuanboxue xueshu chuantong bijiao yanjiu. *Xinwen daxue*, No. 1, pp. 53-63.
- 展江(2008)。〈審慎而積極地調整國家—媒體關係〉。《國際新聞界》，第7期，頁24-29。
- Zhan Jiang. (2008). Shenshen er jijidi tiaozheng guojia meiti guanxi, *Guoji xinwenjie*, No. 7, pp. 24-29.
- 許紀霖(2005a)。〈學術期刊的單位化、行政化和非專業化〉。《新華文摘》，第4期，頁127-128。
- Xu Jilin. (2005a). Xueshu qikan de danweihua, xingzhenghua yu feizhuanyehua. *Xinhua wenzhai*, No. 4, pp. 127-128.
- 許紀霖(2005b)。〈知識的生產是如何「再度國家化」的？〉。鄧正來(編)，《中國書評》(第一輯)(頁113-116)。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Xu Jilin. (2005b). Zhishi de shengchan shi ruhe zaido guojiahua de? In Deng Zhenglai (bian), *Zhongguo shuping* (diyi ji) (pp. 113-116).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葉繼元(2005)。〈學術期刊與學術規範〉。《學術界》，第5期，頁57-68。
- Ye Jiyuan. (2005). Xueshu qikan yu xueshu guifan, *Xueshu jie*, No. 5, pp. 57-68.
- 葉繼元(2008)。〈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學科結構分析〉。《清華大學學報》，第4期，頁126-144。
- Ye Jiyuan. (2008). Zhongguo zhexue shehui kexue xueshu qikan xueke jiegou fenxi. *Qinghua daxue xuebao*, No. 4, pp. 126-144.
- 楊玉聖(2004)。〈學術期刊的境遇與出路〉。《社會科學論壇》，第10期，頁67-70。
- Yang Yusheng. (2004b). Xueshu qikan de jingyu yu chulu. *Shehui kexue luntan*, No. 10, pp. 67-70.
- 楊玉聖(2006)。〈學術期刊與學術規範〉。《清華大學學報》，第2期，頁43-49。
- Yang Yusheng. (2006). Xueshu qikan yu xueshu guifan. *Qinghua daxue xuebao*, No. 2, pp. 43-49.
- 鄧燕、李宗確(2001)。〈核心期刊、一級期刊、優秀期刊辨析〉。《江西圖書館學刊》，第2期，頁47-48。
- Deng Yan, & Li Zongque. (2001). Hexin qikan, yiji qikan, youxiu qikan bianxi, *Jiangxi tushuguan xuekan*, No. 2, pp. 47-48.
- 鄧正來(2000)。《關於中國社會科學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Deng Zhenglai. (2000). *Guanyu zhongguo shehui kexue de sikao*.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 鄧正來(2004a)。〈對知識分子「契合」關係的反思與批判：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會科學》，第6期，頁4-11。
- Deng Zhenglai. (2004a). Dui zhishifenzi qihe guanxi de fansi yu pipan: Guanyu zhongguo shehuikexue zizhuxing de zai sikao. *Tianjin shehui kexue*, No. 6, pp. 4-11.
- 鄧正來(2004b)。〈知識生 機器的反思與批判：邁向中國學術規範化討論的第二階段〉。《西南政法大學學報》，第3期，頁3-6。
- Deng Zhenglai. (2004b). Zhishi shengchan jiqi de fansi yu pipan: Maixiang zhongguo xueshu guifanhua taolun de di' er jieduan. *Xinan zhengfa daxue xuebao*, No. 3, pp. 3-6.
- 鄧正來(2005)。〈中國學術刊物的發展與學術為本〉。《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期，頁7-14。
- Deng Zhenglai. (2005). Zhongguo xueshu kanwu de fazhan yu xueshu weiben. *Jilin daxue shehui kexue xuebao*, No. 4, pp. 7-14.
- 暨南大學(2006)。〈暨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要期刊目錄分類原則〉。取自 <http://skc.jnu.edu.cn/newsshow.asp?id=934>.
- Jinan Daxue. (2006). Jinan daxue renwen shehui kexue zhongyao qikan mulu fenlei yuanze, Retrieved from <http://skc.jnu.edu.cn/newsshow.asp?id=934>.
- 潘忠黨(2008)。〈反思、思維的獨立和研究真問題〉。《新聞大學》，第2期，頁30-33。
- Pan Zhongdang. (2008). Fansi, siwei de duli he yanjiu zhenwenti. *Xinwen daxue*, No. 2, pp. 30-33.
- 蘇新寧、鄒志仁(2008)。〈從CSSCI看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江蘇社會科學》，第2期，頁231-237。
- Su Xinning, & Zou Zhiren. (2008). Cong CSSCI kan woguo renwen shehui kexue yanjiu. *Jiangsu shehui kexue*, No. 2, pp. 231-237.
- 龔刃韜(2005年5月31日)：《大學教授、計件工與學術自由》，取自《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5年5月號，總第38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3011g.htm>。
- Gong Renren. (2005, May 31). *Daxue jiaoshou, jijiangong yu xueshu ziyou*, Retrieved from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3011g.htm>.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llison, P. D., Long J. S., & Krauze, T. K. (1982). Cumulative advantage and inequality in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5), 615-625.
- Bourdieu, P. (1985). The market of symbolic goods. *Poetics*, 14, 13-44.

-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2004).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R. Nice,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1).
- Chubin, D. E., & Hackett, E. J. (1990). *Peerless science: Peer review and U.S. science polic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rane, D. (1972). *Invisible colleges: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scientific commu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 H. T. (2011). Anonymous review as strategic ritual: Examining the rise of anonymous review among Chinese communication journal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6), 595–612.
- Pan, Z. D. (2000). Improvising reform activities: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China. In C. C.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pp. 68–111).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leeboom-Faulkner, M. (2007). Regulating intellectual life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Quarterly, 189*, 83–99.
- Swartz, 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lder, A.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uckerman, H., & Merton, R. K. (1971). *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 Institutionalisat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referee system*. *Minerva, 9*, 66–100.

## 本文引用格式

李紅濤(2013)。〈中國傳播期刊知識生產的依附性：意識形態、機構利益與社會關係的制約〉。《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3期，頁81–112。

## 鳴謝

本文在作者博士論文(香港城市大學, 2009, 原文為英文)部分章節的基礎上改寫而成, 感謝接受訪談的期刊編輯。導師李金銓教授多年來耳提面命、言傳身教, 學生深懷無盡感激。李立峰副教授亦師亦友, 是我輩治學的楷模。感謝張讚國教授、何舟副教授等導師組成員的幫助。感謝陳韜文教授、翁秀琪教授及本刊兩位匿名評審建設性的修改意見。本研究得到浙江大學紫金計劃、求是青年學者計劃的資助。

